

价值传承与价值创新的文化自觉

□谭好哲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风靡西方学界而近十多年来也给予中国学界以很大影响的文化研究,将文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到了理论研究的前沿。从一般关系上来说,一方面文艺是文化的形象肖像,在文化的记忆、传承与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文艺本身即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体现着文化创生最具时代活力和人生底蕴的部分。在全球化大大加剧了跨文化交流的当今时代,一国的文艺创造就其对于文化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肩负着传承和发展自身文化的使命,同时也承担着向异域他国的接受者传播自身文化、建构自身民族文化形象的责任。而这两个方面又不是分为两截的,对外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展示什么样的文化形象,是与其如何认识自身文化、怎样对待自身文化、特别是如何创造自身文化贯通为一、密不可分的。

应该说,随着全球文化交往活动的增多,随着中国在当今世界和平崛起的现实可能性的日渐增强,自觉地有意识地借助于文学艺术的形式向国外传播中华文化,不仅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学人和文艺家们的共识,而且也已列入国家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纵观古今历史,任何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崛起,不仅需要经济、军事等国家硬实力的强大支撑,也需要具有内向凝聚力和向外感染力的文化软实力相辅相成。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与之相随的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同样需要一种基于价值传承与价值创新的文化自觉,需要文化的光照与引领。但是,如果我们检视一下我们已经做过的,看看我们对外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传播的现实状况,则不能不说在这一方面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比如说,我们与美国、韩国等发达和较为发达国家之间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贸易极不平衡,引进远远大于输出;再比如说,我们的对外文艺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与全球文化传播时代的传播机制和技术手段还很不适应;如此等等。然而,相较而言,这些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最主要的突出的问题在于:什么

才是我们应该拿出去的东西?具体说我们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文化产品,从而塑造何种文化形象,并将之提供和展示给他人观看与欣赏?这在不少文艺家们的心中并不都是清楚了然的,即使在那些有所意识的人那里,其认识也往往是极为不同的。前些年,有些批评家批评有的中国导演的电影作品是以展示中国人的贫穷、愚昧和落后来迎合和满足西方人的“东方”趣味和“东方”观感,因而不是以艺术的形式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增进他国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生存现状的感知和理解,反而是加剧了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在中国认知上的误解和偏见,其实就已经从一个侧面切入到了这里所提出的问题的。

无须讳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整个国家在各个生活领域均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不少差距的,而且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贫困、落后的现象仍比比皆是,并且愈是将观察的视野向既往的历史时代和边缘化的地区推移,这种状况就愈加突出。因此,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表现这些贫困、落后的生活状况和现象,并不应该成为禁区,问题不在于是否表现了这些东西,而在于这种表现究竟意图传达和张扬什么样的人生信念和价值理想,简言之就是要传达什么样的文化观念。人们对这类作品的的不满和批评,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它们所展示的国人生活事像过于寒酸,而在于其所传达出的文化观念大有问题。进而言之,从所传达出的文化观念角度看文学艺术创作,那些笔墨并不专写贫困、镜头并不聚焦落后,反而充斥着繁华富足的生活场景、流光溢彩的生存画面、卿卿我我的俊男靓女的作品,也并不一定就是值得肯定的。这后一类作品在当下的文坛艺苑其实很多很多,它们让人看到了灯红酒绿

的人生、雍容奢华的事像、虚浮淫情的浪漫,却不能令其从中体验到深沉的人生况味,获得生存的启迪和理想的光照,内在的文化意味不仅极为肤浅,有的在人生观、价值观上还是经不起评断和批评的。在早前的时期,人们往往把中国当代文艺出不了大家大作归咎于对创作题材的人为限制,现在限制基本上不大存在了,为什么还是较少大家大作品产生出来呢?文化的贫困,内在文化深度的缺失,传统文化命脉的中断,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在。

优秀的创作,历来都是深深地扎根于时代生活的现实土壤之中的,同时也是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精神文化的丰厚沃野之中的,文艺的题材、故事通常得自于现实生活,而其风骨、韵致则往往受惠于民族精神文化的润泽,因而优秀的文艺创作通常既是优秀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呈现者、传承者,又是优秀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弘扬者、创造者。远的不论,就就中国现代当代文艺来看,那些经典之作往往都与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文化传统血脉相连,即使是那些以反传统自居的文艺家也不例外,这一点只要想一想“五四”文学革命新潮中的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学创作即可明白。70多年前,鲁迅曾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鲁迅将这些人称为中国的“筋骨和脊梁”(《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正是这些中国人的“筋骨和脊梁”创造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代表。中华民族能够在这片大地上绵延不绝、自强不息地生存与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赖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滋润和支撑。可以说,这显示着中国人“筋骨和脊梁”

的优秀文化传统既是历代中国人借以彰显生存意义与底色的价值之源、文化道统,也是当今时代的中国人、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应该着力加以珍视、传承并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加以弘扬、创新的精神之魂、文化血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当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做得很不够。我们的大量所谓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醉心于展示宫廷的奢靡与腐烂、战争的血腥与杀戮、政治的狡诈与阴谋,而大量现实题材的作品则充斥着暴力凶杀、婚外恋情、官场腐败、人生荒唐,从历史题材中你感受不到汉唐气象的雄壮盛大,感受不到中华历史的波澜壮阔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现实题材的作品中你也感受不到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与新鲜活力,在很多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意味和色调与我们自身悠久厚重的文化传统和蓬勃奋进的现实生活确实是有着很大距离的。相比之下,我们的两个东邻日本和韩国,虽然现代化程度和水平都比我们国家要高,甚至高出很多,但无论日常生活还是文学艺术创作,其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韵味却似乎都比我们要浓烈得多。日本、韩国的影视剧在本国的成功,以及在韩国形成所谓“哈日族”和“韩流”等等,除去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之外,其绵长、醇厚的传统文化韵味应该说为之生色不少。

自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挤压下走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后,中国的文化也在学习西方、改革传统的一次又一次冲击以至运动中经历着现代性的洗礼,晚清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西学引进、民国时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1980、1990年代是几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这些历史关节点一方面为传统文化的改造、民族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有其不容否定的历史功

绩,但另一方面也常常在一些人的心理意识中造成中国文化落后了不行了,传统文化应该死亡或已经死亡的悲观认识,从而产生种种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观念和论断。这样的认识、观念和论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界包括文学艺术界仍然有其一定的市场。应该说,这类认识、观念和论断既与理性的历史认知不符,也与当今时代中国的国力发展和民众需求脱节。从历史认知角度来看,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借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风光一时,中国文学史上的传统经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的一拍再拍,固然有商业操作的因素,但广大受众的文化认同、心理同构,事实上也是其收视率和投资回报的重要保证。这说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仍然是有其传承价值和历史认同的。从民众需求角度来看,正如一个个体的人在解决了生活上的温饱后必然会有精神上的需求,会追求更有尊严更有品位的人生一样,对于已经走上世界历史大舞台的中国人民来说,渴望从文学艺术的镜子中反观自身体面一些、文明一些、更有意义一些的文化形象,不仅使自己能够在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积极向上、丰富多彩当代民族文化中获得光照,以滋养自己的精神心灵,陶冶自己的生命情怀,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而且能够将自己健康一些、阳光一些,更加美丽一些的文化形象展示于当下世界,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互识、心灵沟通 and 团结友谊,这应该说也是极为正常的需求。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又有什么理由背对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广大民众的时代需求呢?可以说,有一点文化上的自觉,对于当代文艺家来说是有益而无害的。如果这种文化自觉能够与价值传承和创新在本地有机地融合联结起来,那么这种创作将会更加地深刻厚重,更加富有民族特色,也会更具自信地走向世界文艺的殿堂。

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12)

文学批评之道

□程光炜

毕光明教授在短文《批评的支点》(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对文学批评的意义,以及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多有精彩的意见。比如说:“每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和理由。”又说:“做一个好的批评家比做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更难。这就好比舞者在舞台上把舞蹈跳好,比一个行路人把一段长长的路走完要难得多。确实,要是研究相当于走路,那么批评就是跳舞。研究靠的是肯花力气和时间,而跳舞除了下工夫,还要靠悟性、灵气和先天条件。”这些看法我都同意。在许多文章里,我都尝试着写什么是“文学批评”,它包含着哪些内容,与文学史研究的区别和相同点是什么等等,做过一些初步讨论。我的看法,有一些是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受到的启发,有一些则是根据我多年研究当代文学的经验,有针对性的提出来的。最近几年,我读到的毕光明教授和姜岚女士的当代文学研究文章,虽有“文学批评”的面目,但研究的色彩比较浓厚,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新解》(难以突破的禁区:《红豆》的爱情书写及其阐释的再考察》《〈生死疲劳〉:对历史的深度把握》《〈人面桃花〉:关于时间的小说》《文明落差间的心灵风景——〈哦,香雪〉重读》和《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等等。他们这些内沉潜、文本意识自觉的文章,在我看来就是以“研究”为视野的“文学批评”。因为它们不像很多当代文学批评那样,纯粹从艺术感性出发,最后又落实到感性化的发现和结论上面,而是注意到它们所扎根于坚实的历史背景。例如,我找到他们对这些作品的讨论和分析,一直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进行,不是简单地把作品看成是“作家的创造”,同时又兼顾到这种“创造”与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想的关系。这样的“解释”,当然会比浮泛的文学批评更具洞察力和深刻的见解。

我不赞成做当代文学的都去当所谓的学问家,因为文学批评从来都带给研究者一种新鲜的冲击力,他们对“新作家”、“新作品”的发现和阐释,往往会使我们改变自己的看法,即使再做历史研究和分析,也会受到这种批评的暗示和影响。不过,我也认为,盲目的、一般性的时评性的文学批评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在当代文学界,这样的人和文章确实不少,很多其实都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若干年后,它们被堆放在“文学史”的周边,在占用着有效的研究空间,作者有些还可以拿来做一些次要的材料,但有价值的东西仍然不多。我理解的“文学批评”,是那种不跟着作家、思潮、时尚跑,敢于对作品文本提出质疑,并与它展开更大空间和意义上的对话的文学批评文字。我非常喜欢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和李健吾的《咀华一集二集》,原因就在他们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作家和作品的附属,而是站在作品之外,同时又深入作品文本之中,以“置身处地”的批评方式,与那些杰出的文学文本进行耐心的对话,同时也提出大胆的批评。如李长之对鲁迅缺乏写长篇小说写作能力的深入分析,就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和出色的例子。《批评的支点》一书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人面桃花〉:关于时间的小说》一文中,作者发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末端,秀米能回望自己的一生。站在另一个时间层面,秀米能看到很多人的生命情景。”又比如在《文明落差间的心灵风景——〈哦,香雪〉重读》中,作者分析道:“铅笔盒这个象征性的实物,是这篇小说的枢纽所在,自始至终也是主人公的情结。小说所描绘的,主要就是这个小铅笔盒所引起的内心波澜。铅笔盒作为一个文具,自然可以看成知识的象征。对知识的追求,正是80年代初现代化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上最响亮的话语,乡村中学生香雪的铅笔盒故事,不能不说有呼应关于现代化的历史诉求,故事的讲述多少也就带有叙事性。但是铅笔盒故事里的道具意义,它所不断暗示的,还是人性的魅力。”这显然是那种“历史的理解和同情”式的文学批评。它有趣味的地方是,作者不先把自己当成批评家,也把自己当成和我们一样的读者,去“置身处地”地替香雪着想;但与此同时,它又无意识地带着我们和读者,站在距香雪有一段的地方看她“人生的风景”,把她和描写她的小说“历史化”了。在这个意义上,铁凝的《哦,香雪》既是“80年代的小说”,也是“80年代的问题”,也就是作者试图揭示的80年代的“现代化问题”,这个国家的发展方案是如何被落实到这座小山村的,它是如何通过这群乡村孩子与火车的关系,被带到小说中去的。如此处理,就把小说的“重读”进一步“问题化”了,它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当时未被文学批评注意到,而现在却被文学史研究充分地挖掘了的那些极其复杂而丰富的社会内涵。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排斥“文学研究”。相反,我倒怀疑“纯粹”的“文学批评”是否能够超越“职责”层面给读者更多更丰富的启发。所以,我认为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带着读者到文学作品中去,帮助读者去分辨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同时带着读者走出作品,告诉他们这些作品中“发生”了什么,这些在过去和现在正在“发生”的故事对我们的历史和未来将意味着什么。只把读者带进文学作品,而不把他们带出来的文学批评家,是我那不怎么欣赏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只是一些文学作品的鉴定家。当然,我希望看到的那种“理想”的文学批评确实是有很大难度的批评性的工作,是我一直希望尝试,但至今仍感到困难重重、甚至没有办法的一份事业。《批评的支点》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进展,我也愿意它成为我批评的对象。文学批评,只有通过不断的对话它才产生真正的意义。

洞察

“终于把祖宗的文化烙在身上了”

——读《归雁——东南亚华文女作家选集》

□白舒荣

慧慧琴学姐和婷婷文友青睐,嘱我为她们新主编的《归雁——东南亚华文女作家选集》写点文字。接到她们的信之时,我正埋头赶写一本待交的书稿。本当婉谢,却又舍不得这份友情。

“这份友情”,归于二位主编。在编选出版了《漂鸟——加拿大华文女作家选集》后,她们又再接再厉,不辞辛苦,为东南亚华文女作家们发声。两本书的编选,只有付出,无计酬劳,全然出于推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执着。两位行侠的文学义士,令我感动和尊重。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从受新加坡一个文学团体之邀第一次迈出国门至今,虽然也曾开会或出访踏足港台、美欧、日本等地,但亚热带的东南亚国家始终是我光顾最频繁之处。东南亚十国中,除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外,都曾因华文文学出访或会议多次来往。我还有幸作为受邀贵宾先后出席过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举办的会员代表大会,和“亚细安华文文学营”举办的会员双年代表大会。两会虽是两个组织机构,但其成员国,前者以东南亚为主,后者全系东南亚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十个国家里有八个成员相聚,唯独的柬埔寨和老挝华文作家,他们也已在积极联络沟通。

这些不同形式的交往,让我目睹了东南亚华文作家们对华文创作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定居海外的五千万炎黄子孙中,东南亚占了三分之一,数量堪称全球之最。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历史上有些国家曾经发生过严酷的排华迫害。泰国军政府时代,政治上的反共连带将华文教育视为共产主义宣传,进行严格限制。印度尼西亚专制军政府更将汉语和汉语书与黄色书籍、毒品、枪支弹药同等对待,列入与违禁者同罪之列。在长达32年的排华灾难中,仍有不少华人像从事地下工作似的,冒死偷偷教汉语、学汉语、读汉语书,顽强地捍卫中华文化,使汉字和中华文化没有被消灭。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和中华文化曾经的遭遇虽然不全这么惨,但也好不到哪里去。长夜过去,拨云见日,尤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后,东南亚华人和中华文化的地位亦水涨船高,华文文学在写作者和自觉肩负责任的文学社团坚忍不拔的努力下,蓬勃发展起来。

东南亚华文学的艰苦历程,东南亚华文作家们为华文创作付出的超常代价,令我万分感佩万分敬重。无论是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还是大陆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欧美华文作家基本是第一代华人,生长并受教育于母语国,华文创作起点较高。反观东南亚华文作家,其多是华人移民第二代,土生土长,汉语已经不是很赖以维生和发展的第一语言,学汉语受到多种局

当雷锋变成了侠客

近日,一则微电影《雷锋侠》火爆网络,短时间内,《雷锋侠》在各大视频网站的点击率便突破百万。有网友表示,《雷锋侠》是2011最强硬的短片,堪称“神作”。

面对“神作”,不好奇不去看是不可能的。可看过之后,才发现“神作”不神奇,又被人忽悠了一把。那个身穿绿军装,戴着墨镜,披着红斗篷,骑着被自行车的雷锋侠怎么看都是一坑爹的角色。

中国从来就不缺少侠客,当一名侠客,仗剑远行,行侠仗义一直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中国也曾有很多很多的雷锋,助人为乐,大公无私。可如今,我们的社会不但没有了侠客,雷锋也少得可怜。《雷锋侠》其实是一部很巧妙的作品,它用荒诞的手法将雷锋和侠客这个不太相关的角色联系到了一起,使得作品多了几分现实主义色彩。

限,从事华文创作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这一客观因素,使其整体创作水平或许稍逊于欧美,但其作品的自成特色、别具情怀,不容忽视,无法取代。或者说,相较于欧美华文创作,其作品更具有落户国的风味,堪称是更为典型的海外华文学。

交走书稿,赶紧让计算机调出《归燕》。一股亚热带浓郁芬芳的气息扑鼻而至,身在北京,已然沐浴到了蕉雨椰风。展开《归燕》,先浏览目录,但见一些好友笑盈盈迎面相向,仿佛在说:嗨!老友,在这儿见面了!

有道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脑海中粗粗按按文学社团人数估算,东南亚的华文作家,或者写作者,少说也该有数百位吧,女作家在其中当占一定比例。65之数,显然有遗珠,但就我的认知,比较重要的女作家基本包括在内了。《归燕》是选本,不是全集。两位远在加拿大的主编,跨越越海收集东南亚的作品,如果不是计算机时代,该是何等艰巨的工程。以散文为主角的《归燕》,装点了少量小说文本。在以华人第二代移民作家为主阵的行列,亦有零星新移民简笔出征。这些女作家有家庭主妇、华文教师、大学教授、报刊编辑、医生、画家、饭馆老板、企业掌门……身份形形色色,相较于中国大陆,或欧美华人新移民,在东南亚人身上葆有更多中华文化传统,儒家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多见于女作家们的为人和为文。展读《归燕》,花团锦簇,题材各异,辑分为四,可一言以蔽之,篇篇都是情。人情、物情、亲情、文学情、故国情、家国情,情情深浓。展读《归燕》,无论写人还是记事状物。女作家们各献其技,各逞其能。文笔或平实素朴,或温婉华美,篇篇锦绣。这些东南亚华文女作家,让我动心处,还在于其身家性命虽然扎根异国他乡,却难以割断对中华故国的眷恋和爱心,对故国在发展中出现的不尽如人意的种种怪状,不是袖手旁观,更无冷嘲热讽,而是抱持着“我知道,只要有中国文化传承的地方,就会有一群最好的人在铺设着全中国人的理想。海外执教的这些年里,这条理念一直深深的感动着我,而让我切切实实的知道中国文化的可塑性和厚实性”(菲律宾·范鸣英《异样的月光一样的情》)。这些东南亚华文女作家,她们坚持华文创作,不仅出于热爱文学和实现自我,而是把传承中华文化,当做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

“终于把祖宗的文化烙在身上了”(泰国 吴文君《“荒屋学堂”出来的汉语老师》),这篇文中的这句话,可谓《归燕》中的华文女作家们所欣共同表达的心声。但是主题的正确并不意味着作品的成功。《雷锋侠》有一个很宏大的主题,但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都略显单薄。清洁工郑英雄为了父亲的遗愿,也为了自己暗恋的喜欢超级英雄的雯月,化身成“超级英雄”雷锋侠,穿梭在城市中,做一些力所能及、鸡毛蒜皮的好事。当他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之后,黑帮老大为了逼他做商业广告,绑架了雯月,为救雯月,已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郑英雄用最后的力气打倒了黑帮老大,雯月此时才知道雷锋侠就是郑英雄。从整个的故事架构看,这不过是一个清洁工泡妞的故事而已,我们既没有看到侠客的影子,更没有感受到雷锋精神的伟大。仅凭清理小广告,扶老人过马路郑英雄就成了“雷锋侠”?简直就是荒诞可笑。

《红领巾》《青春期》《雷锋侠》,最近一段时间这些微电影抢尽了风头,而且每一部都打着“神作”或者“老男

进入20世纪,伴随着现代汉语的变革与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中国现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吴晓东的《二十世纪的诗心——中国新诗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二十世纪的诗心》)是一本中国新诗研究的论文集,收入了吴晓东近10年有关中国新诗的论文26篇,就其整体而言呈现出以下特征:

该书总体上集中考察的是20世纪纯诗化思潮中探究中国新诗发展,引领中国现代诗歌变革的诗歌流派与代表性诗人。在多篇论文中着重对象征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与探究。形成于19世纪末的西方象征主义诗潮与20世纪初期的后象征主义诗潮,是一股纯诗化的现代性文学思潮,较为全面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诗歌历史变革。《二十世纪的诗心》中的多篇论文都围绕象征主义诗歌创作展开,其中《现代诗中的象征主义》一文择取了儿位重要诗人,着重探讨了他们在象征主义诗艺探索过程中的成就与特点,透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影响的侧影。此外,在《“契合论”与中国现代诗歌》(李金发的诗学意义)《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等论文中都对象征主义诗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对于为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突出贡献的曹葆华更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注重诗歌解读与诗学理论探析相结合。《二十世纪的诗心》一书中既涉及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论,如《北岛论》《王家新论》《李金发的诗学意义》《戴望舒的古典意蕴》等,也有对于现代诗歌史专门问题的论述,如《从“散文化”到“纯诗化”》《诗文本中的文学母题》等。每篇论文无一例外都对诗歌文本的理解为基础,但是论文又都没有仅限于对诗歌文本单一的美学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而是将文本解读与诗学理论研究相结合,使得对诗歌的理解与阐释超越了字面含义的理解,上升到了对诗歌内在本质与诗学品格的深入探讨的层面上。如《李金发的诗学意义》,从李金发的诗歌创作中发现了“审丑”的诗学和“晦涩”的诗学;在《二十世纪的诗心:林庚》中从林庚的解诗理论与具体诗歌创作中发现了其对于诗歌“原质”的关注;在《王家新论》中给诗人王家新的评价是寻找“词根”的诗人,并揭示出其贯穿于诗歌创作中的诗性语言的隐喻特征,以及以“诗片段”呈露的语言特质;在《北岛论》中则揭示出北岛诗歌创作中“政治的诗学”与“诗学的政治”。吴晓东教授以诗歌文本解读为基石,又将文本细读与诗学理论阐释相结合,揭示了诗歌文本的深层底蕴。

《二十世纪的诗心》重新发现了那些被淡忘与埋没的诗人。百年现代诗史中有大波亦有小流,有显在的亦有被忽视或被埋没的细波,处于大波中的诗人与创作吸引了足量的关注与不同方面的探究,文学史亦以这些“重点”为主干展开论述,而那些文学史中的细流以及鲜为人知的创作则很少有人关注。固然有些诗人诗作的被淡忘大多是由于自身审美特征没有更多的发掘价值,而有的则是非正常的被埋没,即有些诗人与创作并非是由于自身审美价值的原因,而是由于受到时代或者政治原因的影响。《二十世纪的诗心》一书重新发掘了那些曾经绽放光芒而后被诗史淡忘的甚至是不为今人所闻的诗人,如在《燕京校园诗人吴兴华》一文中专门论述抗战时期沦陷区北京的优秀校园诗人吴兴华的诗歌创作。《对自我的探究与追寻——析曹葆华的〈无题三章〉》中对曹葆华早期创作的关注,以及在《沦陷区诗歌的历史面向》《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诗文本中的文学母题》中,对长期被埋没而又笔耕一生的诗人朱英萼的关注。这种关注对于诗史以及文学史而言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探究与追寻——析曹葆华的《无题三章》》中对曹葆华早期创作的关注,以及在《沦陷区诗歌的历史面向》《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诗文本中的文学母题》中,对长期被埋没而又笔耕一生的诗人朱英萼的关注。这种关注对于诗史以及文学史而言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探究与追寻——析曹葆华的《无题三章》》中对曹葆华早期创作的关注,以及在《沦陷区诗歌的历史面向》《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诗文本中的文学母题》中,对长期被埋没而又笔耕一生的诗人朱英萼的关注。这种关注对于诗史以及文学史而言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探究与追寻——析曹葆华的《无题三章》》中对曹葆华早期创作的关注,以及在《沦陷区诗歌的历史面向》《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诗文本中的文学母题》中,对长期被埋没而又笔耕一生的诗人朱英萼的关注。这种关注对于诗史以及文学史而言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探究与追寻——析曹葆华的《无题三章》》中对曹葆华早期创作的关注,以及在《沦陷区诗歌的历史面向》《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诗文本中的文学母题》中,对长期被埋没而又笔耕一生的诗人朱英萼的关注。这种关注对于诗史以及文学史而言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探究与追寻——析曹葆华的《无题三章》》中对曹葆华早期创作的关注,以及在《沦陷区诗歌的历史面向》《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诗文本中的文学母题》中,对长期被埋没而又笔耕一生的诗人朱英萼的关注。这种关注对于诗史以及文学史而言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探究与追寻——析曹葆华的《无题三章》》中对曹葆华早期创作的关注,以及在《沦陷区诗歌的历史面向》《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人的镜像自我》《诗文本中的文学母题》中,对长期被埋没而又笔耕一生的诗人朱英萼的关注。这种关注对于诗史以及文学史而言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dzhelaxin@sina.com

20世纪中国纯诗化诗潮的倾心关注

□马雪洁

读者评论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dzhelaxin@sina.com